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成立,陈云任主任(前排左六)。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后,我先后担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苏北行政公署财经处粮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计划处处长等职,曾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负责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食和棉花,直接参加了上海解放初期陈云组织部署的对资产阶级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著名的上海“米棉之战”。

新生政权面临着严峻的 经济形势

1949年5月,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中国上海得到了解放。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已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已成定局。但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敌特势力仍不死心,企图从经济上搞垮共产党,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们先是抗拒人民政府关于合法货币的规定,用银元扰乱金融市场,其后又欲控制“两白(米、纱)一黑(煤)”,置新上海于死地。

在刚解放的上海,尽管军事

上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政治上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投机家们垄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蓄意制

造混乱和困难。据调查,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我们接收上海时,直接能控制的粮食只有2000万斤,而要维持上海正常局面,入冬前至少需存粮4亿斤,为对付粮食投机商,应付突发事件,需在上海附近集积6-8亿斤粮食作储备。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对上海进行封锁,并断言:共产党有本领打天下,但没有本领治天下,有本领指挥打仗,但没有本领管理经济。加之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使上海人民对物价与社会形势非常关注,一有风吹

陈云领导的上海

许毅(口述)

李正华(整理)

「米棉之战」



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

因此,解放初的上海,由于粮食、棉纱的影响,加上解放大军南进、新解放区扩大,人民币发行大增(1949年7-10月3个月增发5倍),物价控制不住。共产党人面临的是市场难以掌握,物价一日三涨,早、中、晚行情瞬息万变的严峻的经济局面。

像上海经济混乱的状况在当时全国的新解放区,特别是大中城市也都普遍存在。但是,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在旧中国,它既是外国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基地,它的经济情况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因此,要建立并稳固新生的政权,就必须首先在上海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的投机垄断市场经济,使上海成为有控制的、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市场,即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倡和肯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这对于当时尚没有多少经济管理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大难题。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是陈云同志。他认真分析了全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认为要在经济领域战胜资本家对新生政权的捣乱和破坏、克服经济危机,其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的能力,即能否控制主要物资的吞吐能力。只要国家掌握了主要的战略物资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财政以及主要的运输条件,并且以国营贸易公司为主体来有计划地组织物资吞吐,有理有节地进行商品市场斗争,并进一步占领批发市场阵地,就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有领导的统一市场,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秩序。

陈云坐镇 从容调度 化解危机

1949年8月,陈云同志来到上海召集

全国财经会议,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同志要求各地财委、财政、银行和国营贸易公司,对资金的运用和主要商品吞吐,不要搞得太死,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及时抛售,要根据市场行情有计划地吞吐,要从稳定物价调控市场这个全局出发,占领市场、组织市场、控制市场、领导市场。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还仔细、认真地研究了上海的经济情况。经调查研究,他很快



发现了导致上海物价猛涨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财政收支赤字大,货币发行量多;二是市场需求的物资调度不及时。认为“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纱布,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他认为当时的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物资供求问题,而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又只是几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可以说是把握住了当时上海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针对投机者都以大米、面粉、棉花、棉布、棉纱、煤等商品作为垄断市场、兴风作浪的手段,陈云同志果断指出,抑制上海物价上涨关键就是要控制与人民吃穿等基本生活直接相关的粮食和纱布,二者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



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们只要掌握这几种非常平常而又是国计民生中的主要物资,就能够控制市场。

同时,陈云同志客观地分析了物资来源及运输条件,指出这一目的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1948年底,上海人口为505万人,1949年5月达到550万人,扣除农村人口,市区人口为440万人,再扣除解放后暂时回去的40万人,当时市区常住人口为400万人,按每人每月供应11公斤左右口粮计,上海每天需供应150万公斤左右大米,这些可以从老根据地调拨。

根据运输条件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陈云同志作了具体部署:从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及东北等地调运粮食3-4亿公斤左右,存储于南京、杭州之间,以支撑上海为中心的市场。命令东北从11月15日至30日,每日通过铁路运送500-600万公斤粮食入关,以应付京、津地区市场的需要。陈云通过周密的调查、详尽的计算和安排,各解放区也以大局为重,克服困难,积极支援上海的经济斗争,使上海在短短的时间内便集储了必要的粮食。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的国营粮店掌握了17亿公斤粮食,足够一年半的周转,打垮了大投机商。

纱布问题,既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涉及全国的问题,陈云同志为此作了全局性的安排。为控制汉口、湘、粤纱布市场,他从上海调剂纱布至武汉;为应付西北局势,他命令西北财委将积存于陇海沿线的纱布尽速运送西安。根据陈云同志的部署,1949年11月开始,全国贸易公司统一行动。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从上海、天津、北京到武汉、沈阳、西安,同时向市场抛售纱布。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各主要分支行、处一律暂停贷款,并开始收回贷款,财税部门也确定几种能起收缩作用的税收,于11月16日至30日左右在全国征

收,以为配合。

“米棉之战”的最后胜利



国营粮店由于在短期内控制了足够的粮食,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当时私营米店将零售价格哄抬到16万元一石,而我粮食公司抛售价仅8万元,相差一倍。我们的粮食公司在上海设立64处营业所和75处特约米店,国营粮食的供应量超过批发市场的总成交量,狠狠打击了投机商,保证了人民需求,控制了市场,平抑了物价。

上海的国营花纱布公司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吞吐,开市时投机者有购进的,也有抛出的。由于行情看涨,投机者大量吃进,国营贸易公司就大量抛售,投机家银根有限,吃不下时,市场行情回跌,于是国营公司在抛售的同时就降低了牌价,投机者见市场有变化,也急忙将手中的物品抛出,于是市价下跌,这时国营公司按兵不动,市场显得十分疲软,逼得资本家走投无路,不得不求国营公司低价收购。这样进行几个回合,一般资本家都经受不住打击,自动要求停战,有的工业资本家还要求为国家加工订货或包购包销,把他们的生产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上海“米棉之战”仅仅一个多月(如从8月部署时算起到11月底初战胜利也只有3个月),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把一个受通货膨胀毒害达12年之久又为投机者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市场,初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控制的、并实现了战略物资有组织有领导进行供应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上海“米棉之战”的胜利,对于稳定物价,控制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为新中国财政经济秩序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楚文)